



1 百年以來，中國人抱持著兩種僵持不下的生活與思想的方式。一種舶自西方，另一種則源於祖宗。一百年之前，每一位中國人大概都偏向後面一種。中國人始終相信，中國人較為聰慧、更加文明，也要比其他族群優越許多。然而，一系列的殘酷打擊逐漸動搖了這種自信。中國人發現在軍事方面無以自保，因此邊境才屢遭入侵。結果是被迫允許歐洲人與美國人居住於中國，這又引致了一種更令人不安的觀念入侵。

很快（人們）就發現，顯然中國在某些方面存在不如西方之處。當時，中國在軍事戰力望塵莫及，於數學領域自嘆弗如，對科學技術又知之甚少。中國尚未懂得機器，因而就無法生產西方工廠可以製造的批量規模的貨物。

起初，這些事物並不會讓中國人深有所察。畢竟，這些頂多是局部的物質問題，“蠻夷”（他們將西方人視為蠻夷）在這方面是可以不遑多讓的。我們知道，在古代歐洲，羅馬帝國覆滅之際，蠻族正是在戰爭領域高出一籌，但這卻不至於讓我們以為蠻族人在總體上優於羅馬人。我們還知道，愛

斯基摩人以及其他近於自然而居的人群更為熟悉野生生物，還有著更為出色的獵手，但這也不會讓我們萌生自卑感。同樣道理，在此前很長一段時間，中國人並未拜服於西方科技。他們視西方科技猶如一種驚艷魔術的伎倆，這不過雕蟲小技而已。

相比這些物質的東西，中國人更加珍視的是精神方面。儘管他們能僅結合各種物質材料的技術具有更可廉價製造貨物的價值，不過，他們更看重的是維繫人們共同生活之和諧與福祉的藝術。他們固然理解財富的價值，但深知財富對個體安危、生命圓滿、子孫孝敬的無補。在這些方面，他們無從認同西方之道更優。

跟隨這番貫穿全書、間或詳玩的巡航，可能大多數中國人最後也難免質疑，他們並沒有秉持這種傳統生活與思想方式的優越感受。其中很多人已經轉向一種稱為共產主義的西方哲學，這已成為執政中國的共產黨的指導思想。

我們有些人不願意承認共產主義屬西方學說。毋庸置疑，蘇聯的共產主義有自身特色，且蘇聯文化無疑具有亞洲淵源。但是，馬克思（Marx）與列寧（Lenin）思想確實在西方哲學淵源有自，是西方思想序列的終端產物。就其以組織人民成為大型集體予以統治的趨向，其對物質事物的強調，其為經濟重要性的賦予，總體上都更親近於西方哲學，而非它所取代的中國傳統思想。

在二十世紀的前葉，中國人尚有一種為傳統文化辯護的

姿態，無疑與當時中國國力與威權的式微有關。然而，在中國共產黨執政後不久，中國戰士就可以宣稱已經取得對世界上最強國家裝甲部隊的勝利，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已成為一股重要力量。於是，儘管出人意料卻也順理成章的是，中國人從中國共產黨身上挽回了自信，這種具有歐洲淵源的統治學說，也就應當套上中國歷史的光環，從而聲稱歷史上偉大的中國思想先驅也屬中國共產黨的智識遺產。

倘若在有些方面中國人的所思所為難以理解，我們就聳聳肩並將其視為怪異譎詭、不可理喻的人，這可是毫無意義的。如果能夠同情理解、換位思考來疏解困擾，我們就會發現，中國人也是如我們這般相當通情達理的。諸多分歧源自這麼一個事實，他們並不總是重視我們奉若珍寶的東西，而又傾心於我們置若罔聞的事物。要闡明這一奧妙，且聽中國早期哲學家所講述的這麼一個故事。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叩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為槩。”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

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問，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眾，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无乏吾事。”¹

這樣一番對機器時代的譴責，撰就於中國二千多年前。若將之與英國小說家愛德華·摩根·福斯特（E. M. Forster）發表於1951年的評論對觀，可謂相映成趣。福斯特寫道：“我們不能一如既往做出科學發現並付諸實踐，從而實現社會與政治的穩固，如此將摧毀基於更基礎性發現的既有安排。……科學……給予我們一個內燃引擎，而在我們吸收消化並經歷其浸染社會系統的陣痛之前，它卻利用了原子能去摧毀任何可能展露的嶄新秩序。要是人們只求一味更新，又談何實現與所處環境的和諧呢？”²

這便有別於前述中國文本所涉問題，可當我們考慮到，時隔兩千年之久，地隔一萬里之外，這兩番話同樣發出針對機械的譏議，就不免要感嘆這種不謀而合了。當然，福斯特先生所持有的是西方人罕為接受的結論。不管多麼強烈地譴責原子彈的存在，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不是祈求少有發明，而

¹ Legge, *The Writings of Kwang-ze*, 1.319-320. 譯注：原書非直譯，在此仍注引《莊子·天地》原文。

² Forster, *Two Cheers for Democrac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51), pp.90-91.

是更多更優的創造，這當中也包括無疑為我們所寄望的保護自身以及後代免於星球損毀的科技。

中國人士卻很少像我們這般致力於機械，但他們在實際問題上也少有全然拒斥機械設備的姿態，秉承著前述故事中農民所表露的反對“機事”觀點。雖然尚未發展出成套的科學理論，但中國人也力求採用那些顯然有利於福祉的設施。

誠然，這一故事中，農民希圖全性保真以求維繫和諧的觀念不能代表所有中國人的思想。但這是中國觀念的特質，它意味著不倚重某些神啟禁令或是哲學原理，而是回歸於人類個體，進而，重視強調的就不是個體的優雅或利益，而是講究心態。

7 而且，這是一個諸多中國著名思想家皆有關切的人性問題，有如中國人士敘述這一問題之際，人性，仍是我們今天（甚至長遠未來）所應面對的議題。

即便是在西方世界，不只是在我們今天才有人深思這種目為寶貴財富的安寧心態。在公元 305 年，正值彪炳千古、居功至偉的羅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統治時代，這位皇帝自願在 59 歲權勢煊赫之際便放棄高位。他急流勇退而歸於田園，親自種菜。而當前任同僚請他再當皇帝時，戴克里先對這位馬克西米安（Maximian）說，如果閣下能來看看這些我親手種植的漂亮捲心菜，就不會再奉勸我重返權力的迷潭啦。¹

1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1.303.

離我們更近的人物，則有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與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他們可以作為諸多人士提倡簡單生活的典型。在十九世紀，社會中的人們渴望避世，並且建造出一些簡單社區，由此產生諸多實踐舉措，實現了這番理念。曾於波士頓的布魯克農場（Brook Farm）住過一段時間的納撒尼爾·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就是這些建造嘗試中最為著名的一例。雖然很多人不免悻悻而歸，但有意思的事實是，即便今天那些在工業城市功成名就的人士，只要足夠有錢，還是會去購置郊區房產。他們往往在週末閒暇時像農夫一樣勞作。正如我們的世界複雜演進，施加於人們精神上的壓力也正成為愈發嚴重的問題。一個重要的證據，就是人們購買尋求心態和諧與緩解精神的書籍與日俱增。精神病專家徒勞無功地亦步亦趨於所無法承受的病患增量，他們已經成為我們社會中工作強度最高的群體。

人們想要避世，可以說變得步履維艱。可是，絕大部分中國人從未如此。相反，他們探尋一種與人為善、安時處順的處世之道。總體而言，中國已經深諳此道。期待這些中國之道可以不加修訂地套用於我們的狀況固然不對，但無疑仍可以從中獲益良多。至少，這些智慧可以讓我們對自身問題另具視野，更顯客觀。

這可能是中國知識可以帶給我們的最大裨益。我們是如此地積重難返，而無法超越於族群與文化。我們的所作所

為，是純粹出於合理並且符合人性嗎？抑或是由於數百年以來的社會習慣以及身處環境的壓力使然？這又能說得清楚嗎？

破解這一問題的綫索之一是考察其他族群，在不同的社會習慣以及居於不同環境的情況下，他們是如何解決同樣問題的。這也是人類學家關於所謂“原始”社會的報告引人入勝的原因。只是就其研究目標而言，基於判然有別的簡單社會的研究是存在隔閡的。畢竟這些社會與我們相去甚遠，不管是對是錯，我們總感覺自身的文化與之天差地別、無從比擬。而中國傳統文明雖與我們的文明迥然不同，卻在很多方面與我們更具有可比性。我們如今的社會具有優越性，可毋庸置疑，在其他某些方面中國也曾有著千百年來的優越屬性，至今或許仍是如此。

9 最為關鍵的是，中國文化可謂是自給自足。在人類創造的最為輝煌的文明體系中，於其發展時代，鮮有與我們西方文化互動如此之少的文明。¹於是，我們可以將中國視為一個宏偉的社會實驗場，其中，數千年來人們的所思所為，往往遠不同於我們。本書就寄望於導引讀者去巡遊這一實驗場，去體會個中的所見所聞。我們將會專門詳細考察中國文化最為純粹的那些時代。進而，後面我們再接著考察中國思想如何應對印度、歐美西方以及蘇聯的影響。

1 這一陳述的一個例外情形便是印度文化。不過，自從亞歷山大大帝於公元前 326 年征服印度之時起，印度與歐洲就有相互影響，之後這種影響有時頗為可觀。

CHAPTER 2

BEFORE CONFUCIUS